

理论视点

2017 年第 3 期 总第 29 期

西安石油大学党委宣传（统战）部 编印

2017 年 4 月



西安石油大学
新闻客户端



西安石油大学
官方微信

目 录

延安时期维护党中央权威的历史启示.....	1
当前思想理论宣传的话语选择.....	5
错误思潮背后的安全“陷阱”.....	10
深入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制度实践.....	13
物联网：推进数字中国建设的关键.....	18
用典释义(1).....	22
推荐书目(27).....	24

报送：省委高教工委宣传部、统战部，
省委宣传部理论处、宣教处、研究室，
省委统战部六处、研究室。

抄送：校领导。
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

主送：各学院党委，各党总支、直属党支部，各院（部、系），
机关、教辅、后勤各单位，各民主党派。

编辑：赵喜军 审核：李国武 2017年4月8日 印发90份

延安时期维护党中央权威的历史启示

杨伟宏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必须维护党中央权威，“党的历史、新中国发展的历史都告诉我们：要治理好我们这个大党、治理好我们这个大国，保证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至关重要，维护党中央权威至关重要”。“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保证全党令行禁止，是党和国家前途命运所系，是全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所在”。“党中央权威，全党都必须自觉维护，并具体体现到自己的全部工作中去”。

延安时期，中国革命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奠定了党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胜利的基础和光明前景。而之所以取得这些深刻改变中国和影响世界的巨大成果，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共中央正确领导的结果，是充分发挥党中央的领导作用的结果。党在延安时期的成功实践和光辉业绩，是在充分坚持和维护党中央权威的过程中不断取得的。这一时期我们党维护中央权威的历史经验，对于今天维护党中央权威、保证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有着重要的历史借鉴意义。

延安时期的历史彰显了党中央正确领导的极端重要性。延安时期，是中国时局剧烈大变动的时期，党是在风云变幻、惊涛骇浪中带领广大人民群众不断前进的。在极其复杂和险恶的环境中抗击与战胜武装到牙齿的日本帝国主义；反击和粉碎掌握全国政权、获得超级大国美国支持的国民党的进攻，并最终推翻国民党政权。党之所以能够披荆斩棘，胜利前行，不断发展壮大，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是决定性的因素。在延安召开的党的七大将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使全党全军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下达到了新的团结和统一。作为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毛泽东同志带领我们党创造性地提出和实施了一系列正确的战略策略，及时解决了中国革命进程中一道道极为复杂的难题，引导中国革命航船不断乘风破浪前进。邓小平指出，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这既是对

毛泽东同志丰功伟绩的高度概括，又充分说明了维护党中央权威、强化核心意识的极端重要性。

把党中央的决策变成行动，是维护党中央权威的着力点和主要方向。延安时期，党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实行的是党政军民一体化的总体战。党的各级组织、广大党员全力以赴，努力把中共中央决策付诸实施，由此形成有力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广大敌后战场，为抗战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形成波澜壮阔的人民解放战争，推翻国民党的统治。这一时期，遵守党的纪律，维护中央权威，不仅体现在思想上政治上与党保持一致，还落实到每一位共产党员平时的一言一行中。勇于实践、艰苦奋斗，是党在延安时期的一个显著特点，也是革命事业不断发展和胜利的重要原因。这一点，几乎所有到过延安和其他根据地、有机会与中共接触的正直人士都有着高度的共识。当年访问延安的美国人约翰·科林在回忆中说：“在延安，我被共产党人为目标奋斗精神所感动，人们在空气中可以嗅到这种气息，他们的衣服破烂不堪，他们的装备缺枪少弹，但他们有为目标奋斗的精神”。1945年到延安的美军观察组评论说：“在共产党那里，有一种生机勃勃的气象和力量。”访问延安的著名学者梁漱溟也感慨地说：延安共产党人“生龙活虎，气象一新”。简而言之，党在延安时期取得的巨大成就，是中共中央高超的战略战术指导的结果，也是全党积极贯彻中央路线方针政策的必然结果，是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在中央领导下艰苦奋斗干出来的。

维护党中央权威必须严明党的政治纪律，与破坏中央权威和党的统一的行为作坚决的斗争。延安时期，我们党内先后出现一些错误思想特别是以教条主义为主要特征的王明“左”倾错误，给革命事业带来很大危害。党中央对此做了坚决的斗争，开展了一次全党范围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延安整风运动。中共中央在六届六中全会决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等文件中，反复强调了“党的统一领导”问题，强调必须坚持“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

央”的原则；明确规定：“党的一切工作由中央集中领导，是党在组织上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各级党的委员会的委员必须无条件地执行。”要求各地党组织“在实行政策及制度时，必须依照中央的指示。……不得标新立异，自作决定，危害全党领导的统一”。毛泽东也屡屡告诫全党：“党的纪律是带着强制性的”，“身为党员，铁的纪律就非执行不可。”当时，对违犯党中央统一领导、违犯党的纪律的行为和现象做了坚决的惩处，绝不因他们的资历、官职和曾经的功绩而姑息或宽恕。毛泽东鲜明指出，“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严明的党纪，确立和保障了党的统一领导体制，保证了全党行动的统一，从而形成强大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强劲地推进了党的事业和中国革命的进程。

切实增强核心意识，形成强大的内聚力，是维护和发挥中央权威的根本途径。延安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共中央的正确决策和成功开拓中国革命胜利局面的伟大实践，赢得全党高度的信任和拥护。正如《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的：“全党已经空前一致地认识了毛泽东同志的路线的正确性，空前自觉地团结在毛泽东的旗帜下了。”“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反映了延安时期全党的心声。向心力产生自觉性和创造力，形成践行中央决策的强大战斗力。比如抗日军民在贯彻我们党抗日游击战方针中，创造了麻雀战、地雷战、地道战、破袭战、围困战、伏击战等战术形式，这些灵活巧妙、神出鬼没的独特战法，打得日本侵略者晕头转向、丧魂落魄、顾此失彼、疲于应付，深陷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这一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受到全党全军和广大人民群众衷心拥护，党的领导人运筹帷幄，根据时局不断作出推进中国革命的战略决策和行动部署；党的各级干部和广大党员群众全力以赴并因地制宜地，创造性地实施党的方针政策，将中国革命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今天，全党和全国人民正在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这既是前无古人、泽被后世的伟大事业，也是充满挑战、非常艰巨的任务。历史经验和客观现实告诉我们，中

国共产党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领导核心，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沿着党中央制定的正确路线前进，才能不迷失方向，战胜前进道路上的艰难险阻，达成党中央确定、全国人民期盼的目标。只有全党服从中央，维护党中央权威，把党中央的决策和部署转化为全党的自觉行动，保证中央的政令畅通，才能凝聚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力量。

延安时期，老革命家邵式平曾一语中的：“全党执行命令，就是战胜敌人的要素。”集中统一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特色和巨大优势，坚决、积极地落实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这既是“全党服从中央”的政治纪律的规范，更是开展和做好工作、践行职责和履行使命的必要前提条件。延安时期的历史启示我们：严明党的纪律，就是守护党的权威和生命线。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指导思想和路线方针政策以及关系全局的重大原则问题上，全党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每一个党的组织、每一名党员干部，无论处在哪个领域、哪个层级、哪个部门和单位，都要服从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确保党中央令行禁止。”今天，我们在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征程中，必须像延安时期那样，“要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党中央提倡的坚决响应，党中央决定的坚决照办，党中央禁止的坚决杜绝”。

（摘自2017年4月5日《光明日报》）

当前思想理论宣传的话语选择

孟宪平 王永贵

推动党的思想理论“落地生根”，关键在于构建话语体系、创新宣传话语。事实上，思想理论宣传有其自身的规律性，需要选择合适的叙述方式、科学的话语体系、有效的话语策略以及生动的话语格调。从宣传的角度看，“曲高和寡”，是由于叙事方式不被听者接受；“对牛弹琴”，是由于选择的对象不合适；“鸡同鸭讲”，是由于对象之间的认同不够。我们的思想宣传，要实现理论叙事向生活叙事转化，实现抽象符号向具体符号转化，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基础上，探索有效的思想传递、意义表达和话语链接方式。

一

思想理论宣传的话语选择取决于宣传者的理论素养和话语风格、宣传对象的知识水平和认知能力以及所处社会环境与现实需要等方面。环境在变化，主客体在变化，理论内容也在变化，宣传话语决不能千篇一律。

1. 选择雅俗共赏的话语。思想理论宣传话语所传递的信息，不仅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也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不仅有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也有体现这一思想的实践成果。但是，在不同宣传者那里，宣讲的话语是不完全一样的，一般而言，如果能够内容和形式互相体现，“作风”与“文风”互相印证，“人品”与“文品”互相促进，总体上都会有好的效果；如果能够在格调方面“芳可涤秽，清可远垢”，或者在通俗方面诚朴敦厚，其影响将是“情无奇而自佳，景不丽而自妙”；如果能在述理上务求精准，在述情上务求真切，群众也会报以热烈掌声。因此，思想理论宣传话语的“着力点”在于如何恰当地传递意义，“着眼点”在于如何更好地吸引群众，“关情处”在于如何提高宣传效果。在这里，突出真、善、美是思想理论宣传工作者必须关注的。“真”在于揭示事物本质，说真话、讲真事、传真谛；“善”在于引导社会积累高尚品德，说善事、传善言、讲善心；“美”在于给人以心灵享受和精神陶冶，体现社会之美，

讴歌生活之美，表达理想之美。这些方面所要求的语言形式要杜绝搬弄辞藻、矫揉造作。当前的思想理论宣传形式存在着一些问题，有的迎合低级趣味而采用不良话语，不是极力说服群众而是刻意逗人发笑，不是传递高尚思想而是掺入无聊心志，这会降低理论的影响力；有的把思想理论庸俗化，将理论意蕴弄得风华萧索，将现实故事修饰得面目全非，这会降低理论的说服力。思想理论宣传话语，不应是夸大其词的“涵盖乾坤”，也不应是割裂意义的“截断众流”，病态呻吟之语带来的是消极沉闷，放诞佻狂之态带来的是轻薄浮浪，“言在此而意在彼”是态度迷离，“混端倪而离形象”是消解本质，凡此种种，皆是病态。

2. 选择符合群众需要的话语。古有古语今有今言，这是时代造成的；到什么山唱什么歌，这是环境变化造成的；“辞之辑矣，民之协矣；辞之绎矣，民之莫矣”，这是社会要求造成的。思想理论宣传话语是阐释党的理论和沟通党群关系的重要工具。因此，它既要有时代特色，又要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心声。前者要求在坚持党的领导下结合社会发展需要和政治方向作出选择，后者要求在实践中全面贯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当前思想理论宣传话语，应该是能追赶社会发展潮流的话语，应该是能够反映中国社会发展方向和发展理念的话语。符合群众需要和时代发展的话语形式是多样的，可以用循循善诱的方式娓娓道来，可以以言高旨远的方式表达意境。思想理论宣传要打上生动的语言印记和美文的意义标识，表达方式要符合时代需要，不能把语言文字搞得空洞无物、无精打采。

3. 选择具有积极导向的话语。思想表达中不良用语的负面作用是明显的，“三俗”语言以粗、鄙、俚、俗、恶为特征，体现的是不良价值导向。一些人把腐败行为说成是经济社会兴盛的表现，把落后愚昧说成质朴忠厚，不顾内容糟粕反而称赏形式精致，不仅颠倒了是非，也混淆了视听。思想上的挪移和话语上的挪喻，给思想理论内容留下了不同的解释空间，很容易造成思想边界的模糊；进而出现思想阐释上的歧义和接受者的困惑迷茫，甚至会瓦解党的理论，歪曲社会事实判断以及语言选择之间的确定性和导向性关系，偏离党的思想理论宣传的要旨。在思想理论宣传

中，言辞偏激会走向极端，有人“粗豪之气形埒字句”，有人“霸气灭尽和平温厚”，有人讲话“皮里阳秋”，有人“浮词浪语”，皆有意气用事之嫌。我们所说的具有积极导向的话语，既讲求内在的精神积聚，又讲求真切的情感表达；既讲求以饱满的热情讴歌社会的进步，也讲求以客观平实的态度针砭社会的弊端。这种语言导向，支持“百花齐放”但不赞成各种思想“公平竞争”，支持“百家争鸣”但不容忍胡言乱语。

二

严肃的或轻松的叙事，严谨的或宽松的叙事，灵活的或谨慎的叙事，都可能带来不同的效果。对于党的思想理论宣传来说，不管采用哪一种叙事方式，做到与生活 and 受众联系的有机性至关重要。

1. 选择贴近生活实践的叙事形式。思想理论宣传不是纯粹的话语演绎，因为“口头上承认这个思想是一回事，实际上把这个思想分别运用于每一个研究领域，又是一回事”。（《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99页）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理论，总是以抽象的形式体现出来的，但理论只有回到实践中才能发挥作用，马克思主义以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都要在实践中贯彻和检验。因此，其宣传方式也必须贴近实践。

马克思在描述旧时土地所有者所使用的经济学语言时指出：“他把自己的对手描绘为狡黠诡诈的，兜售叫卖的，吹毛求疵的，坑蒙拐骗的，贪婪成性的，见钱眼开的，图谋不轨的，没有心肝和丧尽天良的，背离社会和出卖社会利益的，放高利贷的，牵线撮合的，奴颜婢膝的，阿谀奉承的，圆滑世故的，招摇撞骗的，冷漠生硬的，制造、助长和纵容竞争、赤贫和犯罪的，破坏一切社会纽带的，没有廉耻、没有原则、没有诗意、没有实体、心灵空虚的贪财恶棍。”（《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74-175页）在马克思看来，这种口头上的谩骂不可能触动资本主义社会实质，社会主义的宣传者不应采取这种叙事。思想理论宣传的叙事方式与具体环境、群众认识水平以及宣传者的心理偏好有关，根本前提是服从和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目标是让群众入脑、入心。思想理论宣传的叙事形式和理论研究的表述形式有很大差别，学者的

学术叙事与群众的话语叙事也有很大差别，但是，高明的理论要借助朴实的话语来贯彻，严谨的体系要通过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来宣传。为了提高思想理论宣传效果，必须从日常生活中寻找合适的叙事形式，从群众生活中寻找合适的叙事素材，在实践中构建符合现实需要的叙事体系。

2. 选择“情”“意”互现的叙事形式。在思想理论宣传中，“意会”与“言传”有机结合，才能收到好的效果。古代诗词讲究“神理意境”，认为可以通过关系寄托、直抒己见、纯任天机、言有尽而意无穷等方式表达思想。这对我们的理论宣传叙事有很多启示。实现情与意的结合，最好的方法是分析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和正在发生着怎样的变动。通常情况下，人们对“身之所历，目之所见”的事项具有更多的共鸣效应，我们的话语叙事必须在实践中获得意义寄托。它不能凭空赋予某种思想以话语权力，也不能用行政手段实现理论话语的意义和价值。中国共产党强调从群众来、到群众中去，以深厚的情感表达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利益的高度一致性，这就需要深入探讨思想理论宣传的叙事形式。要以情感蕴含丰富的话语去表达思想理论内容，正确处理生活话语与政治话语及学术话语的关系，为群众自觉的价值追求提供恰当的话语表达路径；要以鲜明的人民立场体现话语叙事引领作用，戒除脱离实际、刻意制造词语的做法，力求言有物、语切情。

党的思想理论宣传，必须戒除教条主义的叙事方式。生动的话语叙事源于群众生活和社会现实，因此，依靠群众推进思想理论宣传是可靠而有效的路径。只要我们用心观察、留意生活，虚心做人民群众的小学生，就能够找到很多合适的叙事方式。思想理论宣传有自身的规律，其内容不能随意演绎或铺张，“社会主义自从成为科学以来，就要求人们把它当作科学来看待，就是说，要求人们去研究它。必须以高度的热情把由此获得的日益明确的意识传播到工人群众中去，必须不断增强党组织和工会组织的团结……”（《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14页）马克思强调，不能把理论变成僵死的教条，“少发些不着边际的空论，少唱些高调，少来些自我欣赏，多说些明确的意见，多注意一些具体的事实，多

提供一些实际的知识”（《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页），这是忠于思想和实践的最好办法。

在多媒体时代，人人都有一个话筒，人人都是发声器，官方叙事与民间叙事交织在一起，叙事方式的多样化在客观上排挤了教条主义的话语空间。如果不从现实出发，教条式地搬用理论，甚至照本宣科地重复某些内容；那么，“即使掌握了从一个大民族本身的生活条件中产生出来的出色理论，并拥有比社会主义工人党所拥有的还要高明的教员，要用空谈理论和教条主义的方法把某种东西灌输该民族，也并不是那样简单的事情”。（同上，第575页）有的思想理论宣传工作者喜欢用大话唬人，用套话蒙人，用胡话迷惑人；有的只是搬弄几个新词来吸引眼球，却讲不出实质性内容；有的高谈阔论地叙述理论体系，事后却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这些叙事的基本“戏路”是：把“唯物主义”当套词，用“含混和混乱的词句”糊弄群众，用陈旧的含混不清的术语夸夸其谈，再拼凑几个押韵词句，搞出几个排比句式。这样做会“牺牲活的马克思主义”。应对这类现象的办法是戒除教条主义作风，在群众的现实生活中体现思想理论的真义，从而使人们做到真信、真学、真懂、真用马克思主义。

（摘自2017年第6期《红旗文稿》）

错误思潮背后的安全“陷阱”

彭国华

中等收入陷阱、修昔底德陷阱、西化分化陷阱、塔西佗陷阱是危害我国国家安全的四大陷阱。而一些社会思潮，如新自由主义、宪政民主、“普世价值论”和历史虚无主义等，则充当了这四大陷阱的遮掩物。其中，新自由主义主要针对的是我国的经济体制和经济制度，宪政民主主要针对的是我国的政治体制和政治制度，“普世价值论”和历史虚无主义主要针对的是我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历史文化。

1. 新自由主义与中等收入陷阱。我国经济安全所面临的重大威胁是系统性风险，而中等收入陷阱就是系统性风险的一个重要表现。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是指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贫富分化、腐败多发、社会公共服务短缺、就业困难、社会动荡、信仰缺失等局面，不能顺利实现由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的转型升级。

美国左翼经济学家大卫·科茨概括了新自由主义的7个主要特征：一是要清除商品、服务尤其是资本在全球经济系统内自由流动的障碍，二是政府不再扮演引导和调控经济的角色，三是国有企业和公共服务私有化，四是削减政府的社会福利计划，五是向累退的税收政策转变，六是从劳资合作转变为在政府帮助下的资本单方统治，七是以自由放任的竞争模式代替大企业间合作式竞争模式。不难看出，以美英为主要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其主要目标是通过最大限度减少政府干预、推行私有化、实现累退税、加强资方统治权等手段，最大限度地保护富人与资本的利益。

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加大，实体经济发展出现困难，于是一些主张新自由主义的学者借机大力鼓吹相关主张。他们将“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曲解为“彻底市场化”，否定国家宏观调控；他们将“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曲解为公有制企业“私有化”；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曲解为对新自由主义供给学派

的呼应，主张效仿美国，实行累退税政策，等等。基尼系数是反映居民收入差距的一个基本指标。我国基尼系数在2008年达到峰值0.491之后，近年来呈现逐年下降的态势，但仍然超过了0.4的国际警戒线。这表明我国的收入差距或者说贫富差距还是比较大的。如果按新自由主义者主张的搞私有化、市场化、累退税，最大限度限制政府宏观调控，中国势必掉入中等收入陷阱，严重威胁我国经济安全。

2. 西方宪政民主与修昔底德陷阱。我国政治安全面临的重大威胁是改旗易帜，而西方宪政民主就是一个修昔底德陷阱，是导致我国政治制度改旗易帜的一个重要诱因。修昔底德陷阱的说法源于古希腊著名历史学家修昔底德，他认为，当一个崛起的大国与既有的统治霸主竞争时，双方面临的危险多数以战争告终。

为什么说在我国推行西方宪政民主必然使我们落入修昔底德陷阱并导致改旗易帜呢？这可以从西方宪政民主鼓吹者的主张中找到答案。他们认为，宪政主要包括如下要素或其中大部分要素：成文宪法、国民主权、代议民主、有限政府、权力依宪法划分、确认基本权利保障、司法独立、宪法监督或违宪审查等。一些人主张的西方宪政民主，概括地说，就是推翻我国的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尤其是中国共产党对国家和军队的领导，搞美国式的“民主政治”。其核心主张，是否定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必然性、鼓吹军队国家化、推行三权分立和私有化。这些主张挑战了我国政治制度底线，企图使我国改旗易帜，爆发内乱而引起社会动荡，从而无法挑战美国的霸主地位，最终落入修昔底德陷阱，成为西方国家附庸。

3. “普世价值论”与西化分化陷阱。西化分化陷阱也称和平演变、颜色革命等，是指在西方国家的策动下，通过非暴力手段推翻不奉行所谓“普世价值”的国家政权。所谓“普世价值观”实际上就是西方价值观。我国如果移植、认同西方价值观，必然会解构我们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危及我们的国家安全。

“普世价值”与西方以基督教为中心的价值观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比如，1948年8月成立的世界基督教教会联合会，就宣称“教会是超国家、

深入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制度实践

陈家刚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应该是实实在在的、而不是做样子的，应该是全方位的、而不是局限在某个方面的，应该是全国上上下下都要做的、而不是局限在某一级的。因此，必须构建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体系，确保协商民主有制可依、有规可守、有章可循、有序可遵。”

作为我国人民民主的一种重要实现形式，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既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对人类政治文明的丰富和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协商民主制度建设取得显著进步。

一是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建设。2012年，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要求，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从我国协商民主的定位、制度规范和渠道、基本要求和内容等方面，较为系统地勾勒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蓝图。2014年，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纪念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观点、新的论断和新的阐释，为我国协商民主制度建设提供了基本遵循。2015年2月9日，中央印发《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全面总结了我们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的成功做法与经验，立足于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变化的现实，就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作出了总体部署和顶层设计。

二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建设逐步推进。在中央层面，《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围绕协商民主的特定内涵、发展历程、重要意义、指导原则、主要渠道、制度体系与程序，以及党的领导等方面，进行了科学系统的阐释并深刻回答了什么是协商民主、为什么要加强协商民主建设、怎样加强协商民主建设等一系列关涉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

超民族、超阶级的普世性实体”。正是基于这些因素，西方国家提出的所谓“普世价值”必然是以西方为中心的价值观，具有排他性、扩张性。它实际上是西方推行新自由主义、宪政民主等的思想基础和理论支撑。关于这一点，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说得很清楚。他在《论中国》这部著作中写道：“美国自建国以来笃信自己的理想具有普世价值，声称自己有义务传播这些理想。这一信念常常成为美国的驱动力。”

一般意义上的自由、民主、人权等西方价值观是否适用于中国呢？我国学者陈来曾从四个方面分析了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与西方近代以来的核心价值的区别：一是责任先于自由，二是义务先于权利，三是群体高于个人，四是和谐高于冲突。显然，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取向，与西方近代以来强调个人权利和个体自由优先、强调以自我为中心、强调克服非我及宰执他人的价值观存在着根本不同。因此，对西方价值观决不能无辨析、无批判地照单全收。

4. 历史虚无主义和塔西佗陷阱。我国社会安全面临的主要威胁是执政党和政府失去公信力，社会陷入无序状态。塔西佗陷阱就是用于描述执政党和政府失去公信力之后的状态的。所谓塔西佗陷阱，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当执政党或政府部门失去公信力时，无论它们说真话还是说假话，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民众认为是在说假话、做坏事。

历史虚无主义者，就是要通过所谓“反思”“新解”“人性论”“发现新大陆”等，否定中国近现代革命史，诋毁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和成就，抹黑正面历史人物、革命英模特别是党的领袖，为反面人物“翻案”，从而使我们党失去公信力、瓦解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正义性。他们散布言论，虚无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革命史、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奋斗史以及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践等。近年来，历史虚无主义者还调整策略，更多使用揶揄、影射、戏谑的手段诱导网民自我联想、自我推断，手段更加隐蔽、策略更加复杂、诱导更加细微。这些倾向和现象值得我们格外关注。

（摘自2017年第7期《红旗文稿》）

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推动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提供了理论指导和行动纲领。随后，协商民主各方面具体制度安排如《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建设的实施意见》《关于加强城乡社区协商的意见》《关于加强政党协商的实施意见》等也相继出台，“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的协商民主体系”的框架逐步形成。

三是协商民主的实践体现出广泛多层制度化的特征。从政治协商、政协协商，到立法协商、行政协商，以及社会协商对话、基层协商民主、网络公共论坛等，我国协商民主的实践，从纵向讲，覆盖中央、地方和基层社区，是一个多层次的协商民主制度实践；从横向看，协商实践涉及国家政权机关的立法、行政和司法领域，更有党派和人民政协组织，同时也延伸到社会生活领域；从结构上看，协商民主的制度建设涵盖立法制度、政治协商制度、政党制度、自治制度等等，协商民主的制度框架基本形成；从技术上看，协商实践，既有利用常态的、规范的制度平台开展的活动，也有利用现代信息技术作为支撑的尝试。因此，广泛、多层、制度化既是当代中国协商民主的发展目标，也是其最为基本的特征。

建设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智慧。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的不断健全和完善，有助于体现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色和优势，有助于拓展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渠道，有助于党和国家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但是，我国协商民主制度实践过程中依然面临一些需要克服的挑战。例如：关于协商民主建设的认识还需要进一步统一，协商民主制度建设所需要的理论体系还需要深入研究，协商民主制度建设的规范性合理性还需要进一步提升，等等。

因此，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建设，首先必须明确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建设的主要任务，即深化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理论研究，促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实践探索，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不断丰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内容，为人类的政治文明建设作出贡献。

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必须植根于中国土壤。社会主义协商民

主，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是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必须植根于中国土壤。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具有历史传承性，领导核心是中国共产党，协商民主就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重要体现的体制机制。

继续深化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理论研究。继续深化对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发展历程、协商民主的哲学基础和传统文化、协商民主的制度框架和程序等方面的研究，不断推出新的成果；系统梳理和认真总结我国各地党政部门创造的新鲜经验，加大国际传播，推动在民主问题上的文化软实力建设，以及民主问题上的中国话语权；可以考虑在人民政协这一专门协商机构中成立专业性研究机构，深入推进人民政协理论、协商民主理论、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理论等方面的研究。大力推进关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基本原理、发展史、认识论、方法论等理论体系研究。

深入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建设，关键在于从不同的领域、不同的渠道、不同的层级，在已有的制度规范框架内，嵌入协商民主的制度建设要求。通过各种渠道的协商民主制度，进行创新实验，从实践中寻求理论层面的突破。例如：在干部选拔任用的制度中，增加协商讨论环节；在基层换届选举中，增加协商环节；在预算审议等方面增加协商讨论的要求；在人民调解的制度规范中，增加协商要求，等等。目的在于巩固既有政治制度、体制机制的权威性、稳定性，从而构建以《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为统领的，“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的协商民主体系”。具体来说，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代表候选人的确定要经过充分协商和讨论，加强代表联系常委会的机制建设，健全人大代表联系选民或选举单位的制度，使民众能够真正参与政府决策；加强立法协商，广泛听取社会各界对法律草案的意见和建议；在党际民主中用好协商民主，认真听取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意见，民主党派要充分利用在全国政协大会、常委会、双周协商座谈会、专题协商会等机会建言献策；进一步强化人民政协作用的发挥，重点推进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把政治协商纳入政府决策程序；开展基层协商民主，健

全基层选举、议事、公开、述职、问责等机制。

在国际国内其他重大问题上，善于传播协商理念、善于运用协商技巧、不断完善协商制度。例如：在国际冲突问题上，积极推动民主协商，包括全球气候和环境问题等；在国内不同区域、不同行政区等重大问题上，善于在党和国家既定方针下，推动具体的协商对话活动等。同时，利用协商民主理念，不断提高中国在重大问题上的议程设置能力。

推动协商民主的程序设计。协商民主制度建设既涉及宏观层面的权力制度安排问题，也有在中观层面的法治化问题，更有在微观层面的技术性问题。协商民主制度建设，需要有具体的、可操作的、程序性的方式来体现。可以通过高校、科研机构等多方面的力量，推出一种既灵活多样，又能普遍适用的操作程序，使不同层级、不同地方的协商民主实践具有可操作性的依据。

不断增强协商民主成效。首先，建立健全协商结果跟踪制度，对协商结果进行合理评估，强化对社情民意信息的跟踪反馈；同时要注重探索把落实协商意见建议纳入民主评议范围之中的新形式，积极参与党委与政府相关部门的调查评估活动，使得协商结果在评估实践中不断得以修正完善。其次，注重协商后的信息反馈。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必须通过相应的信息反馈机制对协商结果进行回应，及时把一些有价值的协商意见建议转化为议案，定期接受群众对协商对话共识执行情况的监督。再次，建立相应的问责制。对未经协商或不采纳协商意见而造成决策失误的，可以按照“谁办理、谁负责”的原则，形成必要的责任追究制度，以保证协商的质量。

充分利用新媒体，通过不同方式，传播和养成协商文化、协商意识、协商观念。大众媒体也是培养协商民主意识和个体参与协商能力的有效平台。一方面，大众传媒形成的社会舆论是协商民主中对公共权力进行有效监督的表现形式。另一方面，大众传媒还可以将各种信息公之于众，便于群众参与讨论。将协商民主中涉及的公共利益、私人利益以及协商过程中相关问题公之于众，引导群体协商的注意点，并能引导协商民主向正确的方向发展。

深入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发展，必须体现到中国共产党执政和国家治理上来，体现到中国共产党和国家机关各个方面、各个层级的工作上来，体现到人民对自身利益的实现和发展上来。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应该是实实在在的、而不是做样子的，应该是全方位的、而不是局限在某个方面的，应该是全国上上下下都要做的、而不是局限在某一级的，必须构建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体系，确保协商民主有制可依、有规可守、有章可循、有序可遵。”只有这样，“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才能具有深厚基础，也才能凝聚起强大力量”。

（摘自2017年4月5日《学习时报》）

物联网：推进数字中国建设的关键

陆峰

物联网应用创新了社会治理模式，促进了各领域的绿色低碳发展和社会资源的共建共享。但同时，我国物联网发展仍存在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网络安全问题延伸、物联网管理制度不健全等问题，尚需继续在打造自主可控的物联网产业生态圈、加强物联网安全监管等方面下功夫。

“十三五”国家信息化规划提出了数字中国建设目标，大力发展物联网是推进数字中国建设的关键。物联网发展加速了万物互联时代的到来，深刻地影响着整个经济社会的变革创新。

物联网发展意义重大

物联网应用创新了治理模式。物联网的广泛应用正在改变传统社会管理模式，在线监测、实时感知、远程监控成为了管理新亮点，极大地创新了社会治理模式。无论是安全生产、社会治安防控，还是危险源监控和应急救援等领域，物联网应用实现了在线实时管理，极大地提高了突发事件预判和应急处置能力。

物联网应用促进了绿色低碳。物联网应用促进了各领域用料、用能、用水的精细化，减少了资源浪费，提高了资源利用率，降低了污染物排放。工业物联网技术的广泛应用，让工厂生产线具备了自我感知能力，根据材料配方需要，实时、精准地用料、用水和用能，提高生产资料的利用率，降低废水、废气等污染物排放。能源物联网的发展促进了物联网技术在能源生产、传输、存储和利用各环节的应用，实现用能的实时感知、精准调度、故障判断、预测性维护。

物联网应用促进了开放合作。物联网应用不仅加强了人与人之间连接，更加强了人与物、物与物直接的连接，打通了人与物、物与物之间信息流通渠道，促进了物与物之间的协作。工业物联网应用将不同流水线、不同车间、不同工厂内的机器连接在一起，组成了一个标准化通信的开放网络，强化了机器之间信息流动，促进了机器之间、流水线之间、车间之

间、工厂之间的协同协作。

物联网应用促进了共建共享。由于物联网的软硬件接口、传输协议等标准化，促成了物联网网络互联和信息互动，使得各类开放式的物联网公共服务平台得到了快速发展。视频监控物联网公共服务平台促进了公安、交通、金融、环保、国土等部门视频监控网络的共建共享，统一了视频探头，统一了视频监控网络，统一了数据存储中心，不仅减少了各部门重复投资建设，而且大大提高了网络利用率和覆盖率。

我国物联网发展的短板

物联网产业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射频识别、传感芯片、操作系统、组网协议等物联网关键技术受制于人，核心基础理论和关键技术攻关研究不深入，产学研脱节，技术和产品滞后国外发展步伐，存在代沟。由于缺乏自主可控的通用性物联网操作系统，国内物联网产业生态难以协同配套，严重制约着物联网应用平台化和生态化的发展。

传统网络安全问题正在向物联网领域各处延伸。万物互联让传统网络安全问题借助物联网延伸到基础设施、产业发展、民生服务、居民生活等各个物联网领域，随着物联网大规模应用，物联网安全问题像火灾隐患一样普遍，将延伸到物理世界的各个角落。特别是交通、水利、能源、电力、通信等行业物联网应用安全日益严峻，突发的物联网安全问题有可能影响整个经济社会稳定。

传统安全防护技术难以跟上物联网技术和产品发展步伐。目前市场上做互联网安全的厂商很多，从应用安全、主机安全、存储安全到网络安全，公司数量众多，但做物联网安全的公司却不多。由于和传统互联网环境下的安全保障措施有很大差别，大部分物联网公司都只擅长做物联网应用，但对物联网网络安全几乎都涉及不深。

缺乏体系化的物联网安全管理制度、规范和机构。在互联网安全方面，管理机构、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都已经很明确。但在物联网领域，关于物联网安全管理制度方面，除了工信部门出台了关于加强工业控制系统管理相关规定之外，其他重要领域的物联网数据采集、接入、组网等领域

安全管理和规章制度还存在不少空白。

缺乏物联网接入产品安全评测、风险评估和等级认证等制度。物联网产品被广泛应用到了通信、电力、能源、交通、水利、国防、医疗等各个领域，这些领域的物联网安全事关国家安全，但这些领域的物联网应用产品并没有实行安全测评等相关技术风险评估制度，产品有可能存在安全问题或被黑客远程控制 and 利用，安全隐患和风险极大。

大数据技术应用于物联网治理深度不够。目前，各类物联网产品应用采集了大量数据，由于受限于挖掘技术和商业模式，采集数据的商业价值和社会价值并没有被充分挖掘出来。另外，从物联网本身的角度来看，物联网自身采集的数据对整个物联网治理具有重大的意义，应用大数据技术，可以精准地感知整个物联网网络安全态势。

推进物联网建设的着力点

打造自主可控的物联网产业生态圈。整合产业优势资源，加强产学研联合攻关，打造涵盖物联芯片、操作系统、网络协议、应用程序等在内的全链条自主可控的物联网产业链。重点加快物联网感知芯片核心技术的研发和攻关，加强数模转换技术研究，提高芯片采集精准度和应用稳定性，研发能够满足市场实际应用需求的高性价比物联网感知芯片。加快研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通用、节电、微型物联网操作系统，丰富操作系统网络和应用接口，提高操作系统稳定性。加快研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物联网组网和通信传输协议，加强协议安全保障，提高物联网组网的稳定性和通信传输效率。创新基于通用操作系统的物联网应用发展模式，拓展物联网应用场景，整合物联网应用开发者，构建物联网产业生态圈。

加强物联网安全监管。完善物联网安全监管制度，建立起贯穿物联网产品研发、接入组网、数据采集传输、平台运营等全链条的安全管理制度，确保各环节安全风险可控。建立重点领域物联网接入产品的安全评测和等级认证制度，重点加强能源、电力、水利、轨道、石化、冶金等重要工业控制系统以及国防、金融、电信、安防、医疗健康领域物联网应用操作系统、组网协议、应用软件的安全性测试和评估，确保连接、组网、配

置、设备选择与升级、数据和应急管理等方面的安全可控。顺应物联网安全发展态势，建立物联网安全态势在线监测应急管理平台，推进物联网治理的网络化、平台化和智能化。

加强物联网应用领域大数据开发和应用。加强物联网在产业研发设计、生产制造、物流运输、售后服务等各领域深度应用，促进数据采集和挖掘，推动产业组织和运行模式创新，培育新型信息服务业态。加强物联网在政府社会管理、公共服务、市场监管、宏观调控等领域的深度应用，推进实时感知和在线监测，推动数据决策，提高政府社会治理的预判和研判能力，促进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加强物联网在民生服务领域的深度应用，加强民生数据采集，优化配置民生服务资源，提升民生保障便民、利民和惠民水平。加强大数据技术在物联网网络安全态势感知中的应用，提高对物联网网络安全态势感知能力，确保物联网安全可管可控。

（摘自2017年3月20日《学习时报》）

用典释义 (1)

法者，治之端也。

讲话原文

“法者，治之端也。”在日内瓦，各国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就政治安全、贸易发展、社会人权、科技卫生、劳工产权、文化体育等领域达成了一系列国际公约和法律文书。法律的生命在于付诸实施，各国有责任维护国际法治权威，依法行使权利，善意履行义务。法律的生命也在于公平正义，各国和国际司法机构应该确保国际法平等统一适用，不能搞双重标准，不能“合则用、不合则弃”，真正做到“无偏无党，王道荡荡”。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开放包容，筑就了日内瓦多边外交大舞台。我们要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不能搞“一国独霸”或“几方共治”。世界命运应该由各国共同掌握，国际规则应该由各国共同书写，全球事务应该由各国共同治理，发展成果应该由各国共同分享。

——习近平《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2017年1月18日）

出处

有乱君，无乱国；有治人，无治法。羿之法非亡也，而羿不世中；禹之法犹存，而夏不世王。故法不能独立，类不能自行，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故有君子，则法虽省，足以遍矣；无君子，则法虽具，失先后之施，不能应事之变，足以乱矣。

——（战国末）荀况《荀子·君道》

解读

作为儒家代表人物，孔子中心思想为“仁”，孟子中心思想为“义”，荀子继二人后提出“礼”“法”，重视社会上人们行为的规范。

他认为人与生俱来就想满足欲望，若欲望得不到满足便会发生争执，因此主张人性有恶，须要由圣王及礼法的教化，来“化性起伪”使人格提高。

荀子在儒家“为政在人”治国理念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关于“人治”与“法治”关系的论点，如：“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故有君子，则法虽省，足以遍矣；无君子，则法虽具，失先后之施，不能应事之变，足以乱矣。”意思是法度是治国的前提，而君子是法度的本原。一旦得到了君子，法律虽然简单，也能解决普遍的社会问题；没有君子，法律再完备，也会导致社会的混乱。

由上述观点可以看出，荀子认为“人治”和“法治”均为治国方略，但两者并非等量齐观。他提出“法者，治之端也”的命题，是把法看成是治理国家的首要条件。与“人治”相比，“法治”仅具有工具性特征以及被动性和滞后性等缺陷，需要通过积极能动的“人”加以弥补。因此他主张：“有治人，无治法。”“法不能独立，类不能自行，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

推荐书目（27）

《中华文化简明读本》

于春松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年2月

内容简介：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理解中国丛书”之《中华文化简明读本》立足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展示好中国形象的出版宗旨，著述而成。该书完整、简明的展现了博大丰富又悠长的中华文化的精髓，比较全面系统的从中华文明的起源开始，简明扼要的阐述了中华文化的主要内容和精神，是一本“贯穿国民教育始终”的教科书。本书文字非常通俗易懂，可读性很强，是适合大众 读的一本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读物。